

Doi:10.11835/j.issn.1008-5831.jg.2023.11.004

欢迎按以下格式引用:冯国强,阎芷艺,马通.成渝经济区对川渝两地的经济影响——兼论对新时代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的启示[J].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5):93-105. Doi:10.11835/j.issn.1008-5831.jg.2023.11.004.



Citation Format:FENG Guoqiang, YAN Zhiyi, MA Tong. The economic impact of Chengdu-Chongqing economic zone on Sichuan and Chongqing: Also on the implications for forming a new pattern of western development in the new era[J]. Journal of Chongqing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Edition), 2025(5):93-105. Doi:10.11835/j.issn.1008-5831.jg.2023.11.004.

成渝经济区对川渝两地的 经济影响 ——兼论对新时代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的启示

冯国强,阎芷艺,马通

(兰州大学 经济学院,甘肃 兰州 730000)

摘要:在行政区划调整的同时,地方政府也通过跨地区的发展规划,在不进行辖区行政区划调整的前提下达到地区间整合资源的目的。文章所要回答的问题是,这种突破行政边界的区域发展规划能否带动跨地区的市场整合,进而影响区域整体的资源调配和经济表现?文章以2011年国务院正式下发的《成渝经济区区域规划》作为一次准自然实验,将不涉及跨省区域规划的省份作为对照组,利用合成控制法来估计这一跨地区的区域发展规划对川渝两地(大四川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并结合地级市的面板数据,以及四川、重庆固定资产投资、财政的经验数据和两地经济事务权限配置的变动,检验其中的作用机制,为进一步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提供启示。研究发现,《成渝经济区区域规划》促进了包括川、渝两地整体的经济增长,并且对重庆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高于四川。机制检验表明,跨省合作能有效将地区竞争产生的溢出效应内部化,通过区域协同、市场整合减轻地区竞争产生的负面效果。文章的实证结论能够应用到中央政府在长三角、京津冀等地区持续推动的跨省经济区建设的分析上,并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推断,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增长,既是以省为单位内部竞争的结果,同时也是中央政府利用跨省发展规划来促进区域合作的结果。文章结论对于推进西部开发新格局形成的启示是,有效推进西部地区省份之间的合作,切实形成发展合力,降低竞争性内耗,是塑造西部新发展格局的关键。

关键词:行政区经济;经济增长;跨省合作;成渝经济区;西部大开发新格局**中图分类号:**F061.5;F12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5831(2025)05-0093-13

基金项目:甘肃省软科学专项项目“县域制度质量提升与经济增长动能转换模式研究”(20CX4ZA035);兰州大学“人工智能+”哲学社会科学专项课题资助“人工智能延缓企业寿命周期的机制、路径与证据:基于Cox PH模型”(LZUAIYJYB06)

作者简介:冯国强,兰州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Email: fengggq@lzu.edu.cn。

引言

一种被学界广为接受的观点是,行政边界不断地塑造着中国地区之间的增长互动与增长表现,以至于在一个省级行政辖区内部,地方政府通常会采取调整所辖市(县)行政区划的方式,利用通盘调整资源配置来刺激辖区经济增长^[1-4]。关于行政区划调整与经济表现之间的联系,已经有不少文献提供了经验证据,大到省、市一级的行政区划调整,小至区(县)一级的边界调整^[5-7]。这些文献都表明行政区划调整能够缓解行政区与经济区发展不一致的矛盾,通过整合资源、刺激投资等途径来推动地区经济增长。

当然,除了利用行政区划调整来整合资源,实现经济增长以外,地方政府还采取另外一种发展策略——跨地区的区域发展规划,在不进行辖区行政区划调整的前提下,达到地区间资源与市场整合的目的^[8]。这种策略不但常见于省级行政辖区内部,在省级行政区之间也时常出现,如长三角经济带、关中一天水经济区、成渝经济区等。然而这种不改变行政区划与省际边界来整合资源的发展策略,能否提升地区间的经济表现?对于新时代统筹区域协调发展又有何借鉴意义?为此,文章选择在川渝地区(大四川)实施的跨省发展规划——《成渝经济区区域规划》(下文简称成渝区域规划)作为研究对象,利用合成控制法来识别该规划对川渝地区经济增长的政策效应。以此揭示跨省域发展规划如何突破行政边界塑造的制度藩篱,形成区域的发展合力,为推动区域协同发展尤其是塑造西部大开发新格局提供政策启示。

从重庆升格为直辖市开始,川渝两地先后经历了市场的分割与整合。由于原四川人口较多,所辖行政区域庞大,且包含了重庆和成都两个特大城市,管理极为不便。因此早在1985年,邓小平同志就首次提出四川和重庆分治的设想。到了1997年,出于三峡库区百万移民、中西部发展战略和长江经济带开发开放战略的需要,中央作出建立重庆直辖市的决策,重庆与四川在行政管理上分离开来。从此大四川内部塑造起川、渝之间的省级行政边界,地区保护、市场分割由此而生。1999年开始,国家对西部大开发作出重要部署。2001年3月,第九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纲要》对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进行了具体部署。为了争夺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领头羊地位,作为核心城市的成都与重庆彼此之间经历了一段时期对政策、资本、资源利用的内部竞争。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持续推进,以及国务院对成渝地区区域规划试点工作的推动,促使两地政府意识到竞争过度带来的低效率重复性建设不可持续,从而在2006年左右开始转向思考如何达成协同与合作^[5]。2007年11月18日,川、渝两地政府共同签署了《川渝合作共建成渝经济区的协议》,试图将成渝经济区建成继长三角、京津冀、珠三角之后的中国第四个增长极。2011年4月24日,国务院正式批复了《成渝经济区区域规划》,明确要求把成渝经济区建设成为西部地区重要的经济中心,这是川渝地区区域经济发展的第一个国家级规划方案,标志着两个省级行政区经济的协同合作正式上升到国家战略。

以成渝区域规划为起点,到2016年4月国家发改委、住建部通过的《成渝城市群发展规划》,再到2020年中央政治局审议通过的《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规划纲要》,川渝地区的跨省合作已经成为两地构建合力发展新格局的常态。因此,《成渝经济区区域规划》的实施成为推动地区之间由低水平竞争到协作共赢,从市场保护、市场分割到资源整合的成功典型,对新时代进一步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有很强的借鉴意义。然而这一跨省规划的政策成效、作用机制,以及对政策实践产生的启示,却并不受文献重视。鉴于此,文章利用包含四川、重庆在内,即大四川地区的经验材料,利用合成控制法和计量检验来揭示《成渝经济区区域规划》的效果机制,为新时代区域间合力推

进西部大开发提供经验借鉴与政策启示。

一、文献回顾

探索市场潜力(Market access/potential)是经济活动空间分布的重要机制,市场的分割与整合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市场潜力的变化^[9-12]。无论是传统的区域经济学还是新经济地理学,都热衷于探讨边界调整对市场潜力的塑造,认为由行政边界带来的市场分割阻碍了要素和资源的整合,从而不利于区域经济增长^[9,13-15]。然而,中国过去四十余年的快速增长,很大程度上却是在区域市场分割的现实当中实现的,这似乎与现有文献达成的共识并不完全一致。

对于中国经验与经典理论之间呈现的分歧,一支文献认为中国通过利用外资有效绕开了内部的市场分割,由此实现经济增长^[16]。仅仅从外资利用来解释增长表现,并不是中国增长奇迹的全部内容,这样的解释也无法回应外资利用上处于劣势的内陆地区为何也能实现高速增长,包括本文探讨的大四川地区。因此,从内部因素入手挖掘增长背后的原因,才是理解增长表现的关键。地区竞争也被大量文献认为是促进中国地区间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内生动力^[17-21]。地区竞争可以促使地方政府提供更好的公共产品与服务,以及更加优惠的政策来吸引资本流入,以此推动经济增长;但与此同时也会带来以省级行政区为单位的市场分割和地方保护,从中确保辖区内的企业从中受益^[22]。按这支文献推断,只有当地区竞争带来的增长效应超出市场分割削弱的区域联动的增长效应时,地区之间的经济增长才会产生。这种典型的行政区经济使得中央政府在市场整合上所作的努力,最终可能因无法突破地区间的互动博弈策略而削弱效果^[22]。

地区竞争的解释,包括地方官员为了追求增长业绩采取的策略,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增长奇迹产生的制度成因,即由竞争产生的正增长效应长期以来大于市场分割带来的负效应,但是低估了地方政府间采取合作策略的可能。事实上,无论是长三角地区,还是京津冀地区,省际间的合作由来已久,至今已经达到一定规模。就本项研究所关心的川、渝两地而言,尽管在重庆升格为直辖市之后的一段时间里,彼此之间的行政边界塑造起了地区竞争与市场分割的界限,但从2005年两地在国务院区域规划试点开始,到2007年《川渝合作共建成渝经济区的协议》的签署,双方已经意识到过度竞争的损失和良性合作的好处,逐渐从无序、过度竞争转向跨省合作。显然,地区竞争的解释难以理解同级地方政府之间为何会选择合作策略,自然也就无法解释跨省合作能否带来增长效应。

尽管区域分工与合作的重要性不断被强调,但中国区域分割或区域分工抑制现象仍然十分普遍^[23]。跨省合作的根本目的在于基于已达成的市场规范,利用行政力量的有效介入,减少区域之间的分工抑制现象,以此促进区域间要素的充分流动,实现市场整合与有效配置资源的目的^[24]。当然有文献对区域合作政策提出“泛化”的质疑,认为长期以来附加宏观调控职能的泛化了的区域政策,反而加剧了区域间的竞争程度和分工抑制现象^[25],再加上地方政府在政策执行中参与性不足,政策效应发挥过多地依赖于政策优惠而忽视市场机制的功能,这些因素都使得区域发展规划的政策效果大打折扣。然而这类文献更多地停留在理论探讨上,并未提供经验材料加以证明。

二、估计方法与数据

(一)估计方法

2011年国务院正式批复了《成渝经济区区域规划》,四川的15个市和重庆31个区(县)由此开启经济活动上的跨省合作关系。这种跨省的经济区划可以看作是对大四川地区实施的一项准自然试验。按照政策评价的方法,文章将2011年以后的大四川作为处理组,其他省份则为未实施跨省发展

规划的对照组,通过比较处理组和对照组之间的差异,来识别这一跨省发展规划对川渝两地经济增长的影响。

现有文献大多利用双重差分法(DID)来进行政策评估,但其前提条件较为严苛。不仅要求处理组与对照组的选择完全随机、具有同质性,而且政策的干预不能对对照组产生溢出效应。应用到本项研究当中,政策的随机性难以满足,而且处理组和对照组之间禀赋条件的差异,也使得在成渝经济区发展规划出台前后,二者并不具备共同趋势。即便《成渝经济区区域规划》的出台标志着川、渝两地进一步强化合作,但此前两地的合作基础却是对照组当中其他省份无法比拟的。除此以外,早在2005年的国家“十一五”规划就已经大致明确了成渝经济区的区域范围,《成渝经济区区域规划》作为一项政策冲击并不满足完全外生的模型条件。因此若使用双重差分法估计《成渝经济区区域规划》的政策效应会产生结果偏差。

基于以上特殊性,文章采用Abadie等^[26]提出的合成控制法构造处理组合理的对比对象,来识别川渝之间跨省发展规划的政策效应。这一方法的基本思路如下:虽然难以找到完全类似的处理组和对照组,但可以对没有跨省发展规划的省份组合进行加权平均,来构造出一个与处理组类似的最优“反事实”个体,以此拟合出良好的对照组。这样一来,处理组和构造的对照组之间在政策干预前的相似性就可以通过合适的预测变量来衡量。这样一种数据驱动的做法避免了选取对照组时主观上的随意性,并且能够了解各个对照组在构造反事实个体时的贡献度。

(二)数据

实证分析时以人均实际GDP的对数作为被解释变量,代理地方经济的发展水平。为了利用其他地区指标值的加权平均来近似没有经济区规划时大四川的增长情况,借鉴王贤彬和聂海峰^[5]的做法,文章选取第一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劳动从业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固定资产投资占GDP的比重以及人均实际GDP的增长率作为预测变量。其中:一产增加值会受到工业对增长的贡献,以及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影响,因此能够作为产出的预测变量;劳动从业人数占比、固定资产投资占比作为要素投入的预测变量;人均实际GDP视作产出的预测变量。此外,文章也采用了二产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二产与三产产值比重作为预测变量,分析结论仍然不受影响。

考虑到2016年两部委印发的《成渝城市群发展规划》对2011年跨省发展规划存在的承接作用,并且可能对《成渝经济区区域规划》政策效果估计形成干扰,文章以2016年作为样本截止期。文章共使用31个1997—2016年的省级平衡面板数据来评估政策效应。其中,重庆与四川两个省级行政区的数据合并形成大四川数据。考虑到港澳台地区的差异性,实证分析时将其从样本当中予以剔除。数据来自各省份的历年统计年鉴。为消除通货膨胀的影响,利用GDP指数、人均GDP指数,以1997年为基期对名义变量进行调整。

三、实证结果

(一)跨省发展规划对大四川经济增长的作用

首先以2011年以后的大四川作为处理组,将不包括港澳台地区在内的其他29个省份赋分作为控制组进行加权平均,以此合成与对照组趋势相同的大四川,结果如图1、表1所示。由预测变量对照表和拟合图可以得知,虽然实际大四川和合成大四川的4个指标值差距很小,但在2011年以前,实际大四川和合成大四川的人均实际GDP对数的增长路径差距较大。由于政策干预前合成大四川无法较好地拟合实际大四川的经济增长情况,所以对于政策效应的识别效果也很弱。

考虑到样本期间其他跨省发展规划可能会干扰对大四川经济增长的拟合程度,进一步筛选对

表1 预测变量对照表

	Treated	Synthetic
人均实际GDP的增长率	11.198 02	11.189 28
固定资产投资占GDP的比重	50.231 84	50.203 00
第一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	19.163 80	19.153 03
劳动从业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	54.762 35	54.704 01

地区崛起规划》《中原经济区规划》及《哈长城市群发展规划》,对上述规划涉及的省份样本进行剔除,最终得到不受跨省发展规划影响的对照组样本,分别为内蒙古、辽宁、广西、海南、贵州、云南、西藏、青海、宁夏、新疆。以上述10个省份为对照组再次进行加权平均,从中得到受政策影响的大四川的增长表现,结果如图2、表2所示。

表2的预测结果显示,在剔除受类似跨省区域规划影响的控制组以后,整体拟合情况较好。尽管除第一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以外的其他3个预测变量指标有细微的差距,但政策干预前,合成大四川与实际大四川的增长路径几乎重合,因此能够反映大四川在没有政策干预时的增长状况。图2表明2011年实施跨省发展规划之后,真实大四川的人均实际GDP对数值开始高于合成大四川的人均实际GDP对数值,且二者之间差异逐渐拉大,说明成渝经济区的跨省发展规划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川渝地区整体的经济表现。

表2 预测变量对照表

	Treated	Synthetic
人均实际GDP的增长率	11.198 02	10.847 89
固定资产投资占GDP的比重	50.231 84	53.141 46
第一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	19.163 80	19.224 14
劳动从业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	54.762 35	53.459 20

波动幅度突破了这个范围,差距逐步扩大且持续为正。如果按1997年为基期进行计算,2012年至2016年真实大四川的人均实际GDP比合成大四川分别高出了600、790、1 061、1 616、2 118元,差距十分明显。如果按人均实际GDP的增长率计算,1997—2016年间,真实大四川的年平均增长率约为10.98%,而合成大四川的年平均增长率约为10.46%,前者高出后者约0.52%。对于人均实际GDP的增长率而言,这个细微的差距将随着时间逐渐凸显,在一定程度上改变真实大四川的人均实际GDP水平的增长。不难推断,跨省级行政区划的《成渝经济区区域规划》带来了大四川地区的经济增长,政策效应为正且随时间逐渐显现。

对照组样本。根据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的官网文件,样本期内涉及利用跨省规划进行市场整合的发展规划包括《关于支持福建省加快建设海峡西岸经济区的若干意见》《关中—天水经济区发展规划》《长江三角洲地区区域规划》《促进中部地区崛起规划》《中原经济区规划》及《哈长城市群发展规划》,对上述规划涉及的省份样本进行剔除,最终得到不受跨省发展规划影响的对照组样本,分别为内蒙古、辽宁、广西、海南、贵州、云南、西藏、青海、宁夏、新疆。以上述10个省份为对照组再次进行加权平均,从中得到受政策影响的大四川的增长表现,结果如图2、表2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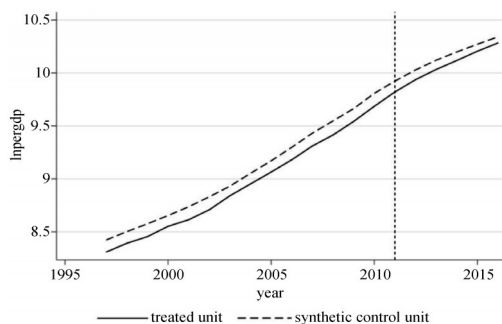


图1 实际大四川和合成大四川增长对比

为更加直观地呈现出成渝经济区发展规划对大四川经济增长的影响,文章绘制了2011年前后真实大四川与合成大四川的人均实际GDP对数的差距,如图3所示。1997至2011年间川渝两地人均实际GDP对数差距在 $(-0.03, 0.02)$ 范围内波动,而在2012年以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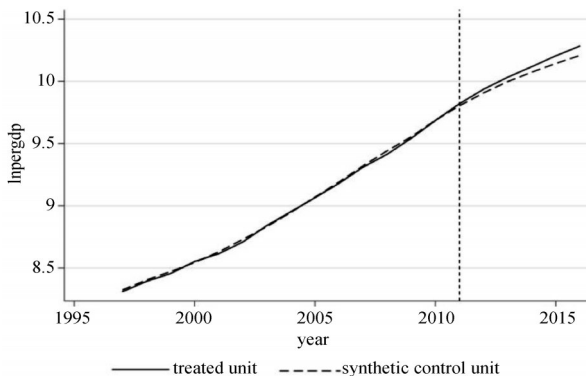


图2 实际大四川和合成大四川增长对比(10个省份对照组)

(二) 稳健性检验

1. 处理组变换的安慰剂检验

借鉴 Abadie 等^[26]、刘甲炎和范子英^[27]的做法进行处理组变换的安慰剂检验。该方法类似于虚假实验,即选择一个没有受到类似规划影响的省份作为处理组,而其他省份作为对照组,通过进行与基准处理一致的加权平均来观察该处理组被解释变量的实际值与合成值的差距。如果差值较大,和大四川情况类似,则表明合成控制法没有提供有力的证据证明成渝区域规划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否则基准结果是稳健的。基于这个思路,文章选取两个省份进行处理组的变换,分别是合成大四川时权重最大的广西和权重最小的宁夏,通过考察这两种极端情况来检验前文的结果。图4、图5分别呈现了对广西和宁夏进行安慰剂检验的结果。在2011年政策干预以前,人均实际GDP对数的走势的拟合情况都较好,可以有效地识别政策的具体效果。2011年之后,两个省份的实际值始终沿着合成值的走势变化,表明没有产生政策效果,通过安慰剂检验。对广西和宁夏的检验结果说明前文合成控制的估计结果是稳健的,成渝经济区发展规划影响了大四川的人均实际GDP水平,而不受其他未观测到的共同因素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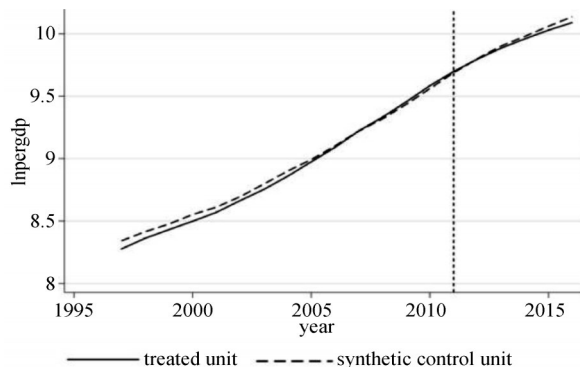


图4 以广西为处理组的安慰剂检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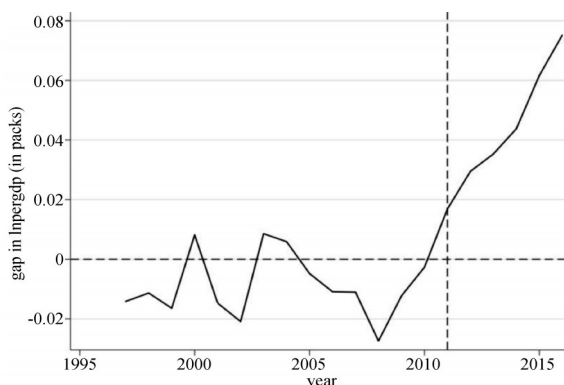


图3 实际大四川和合成大四川人均实际GDP差距变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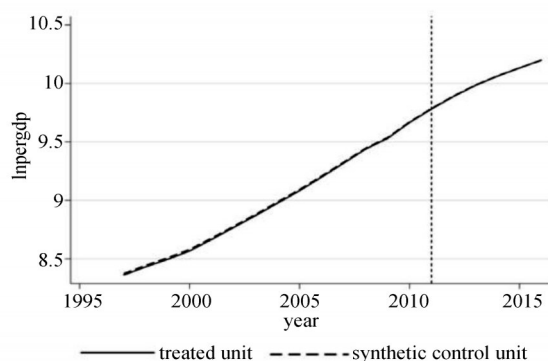


图5 以宁夏为处理组的安慰剂检验

2. 调整政策实施时间的安慰剂检验

继续将规划批复时间提前至2005年来进行安慰剂检验。只有在虚设的政策时间之后合成值与真实值之间未能出现差异,才能表明上文的结果稳健。图6的结果不难发现,在政策干预前后,两条曲线的走势都几乎重合,表明改变政策实施时间以后,政策的影响并不显著,再一次确保了前文估计结果的稳健性。

3. 排列检验

Abadie 等提出了一种类似统计中秩检验的排列检验方法^[26],进一步借鉴这个方法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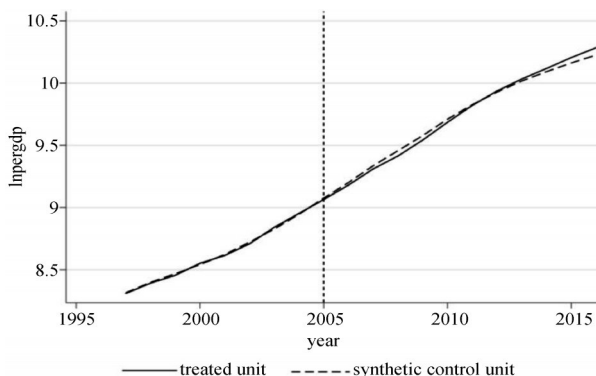


图6 以2005年为政策干预时间的安慰剂检验

考察政策的效果是否在统计上显著。具体做法是,分别将对照组作为处理组,利用合成控制法识别出各种假设情况下的政策效应,得到人均实际GDP对数的差距的变化趋势,然后将大四川的差距与这个差距分布进行对比,如果存在显著差异就表明前文识别的政策效应显著。考虑到对照组拟合情况不好时,利用其2011年以后的差距作为对比的作用也较弱,因此,文章利用均方根预测误差(RMSPE)来对控制组进行筛选。由于大四川的RMSPE值为0.031,因此在控制组中剔除了RMSPE值是大四川4倍以上的省份。最终得到如图7所示的误差分布情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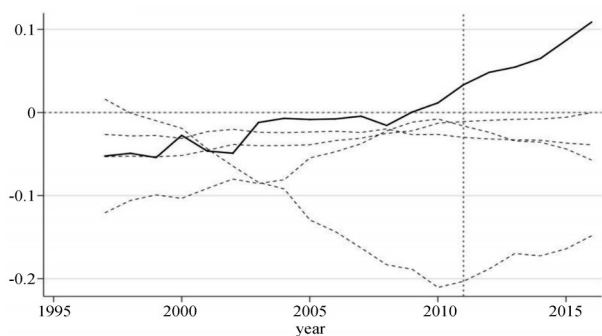


图7 大四川和其他省份预测误差分布图

图7中,实线代表大四川的预测误差变化趋势,虚线是其余对照省份的预测误差变化趋势。不难发现,2011年以前大四川的平均预测误差比大部分省份小,2011年以后大四川的平均预测误差却位于其他省份预测误差分布上方,且取正数,说明成渝区域规划对大四川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在统计上显著为正。由此进一步检验了前文估计结果的稳健性。

4. 放宽对照组选择条件

考虑到与其他跨省发展规划相比,《促进中部地区崛起规划》只是一个更大区域的板块规划,对于跨省市场整合的实质性作用较弱,因此基准分析时将中部6省从对照组当中进行了剔除。这一处理可能造成对照组平均增长效应出现估计偏误。为此,结合《中原经济区规划》将湖北、湖南、江西调整至对照组。此外,海峡西岸经济区也存在相似的特征,因此也将福建、广东两个东部沿海省份重新纳入对照组。按照调整后的15个省份为对照组,以此拟合大四川在《成渝经济区区域规划》前后的变化,拟合结果见图8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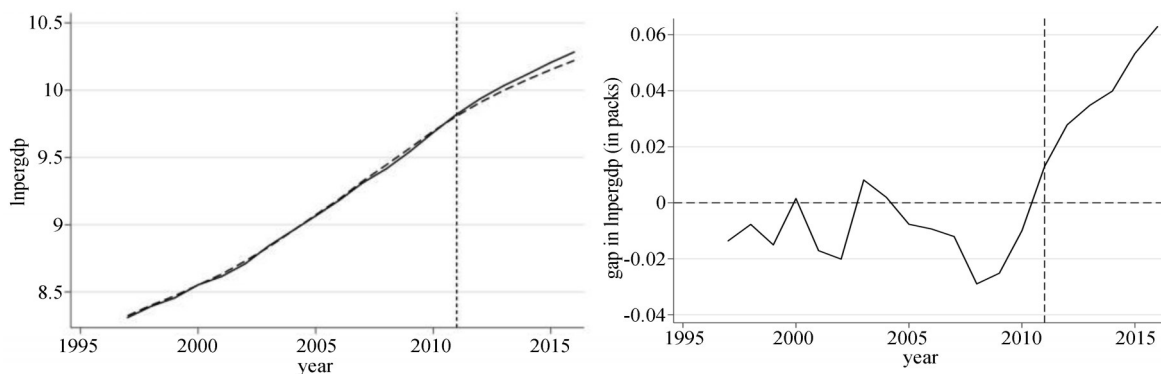


图8 调整对照组样本之后实际大四川和合成大四川增长对比

图8中,左图是15个省份为对照组时合成大四川和实际大四川的增长对比图,右图是15个省份为对照组时合成大四川和实际大四川人均GDP的差距图。两张图与基准结果的分析基本一致。说明即便放宽了对照组的选择条件,2011年《成渝经济区区域规划》的实施仍旧推动大四川整体的经济增长,前文的分析结论成立。

(三) 跨省发展规划分别对四川、重庆经济增长的政策效果

前文验证了跨省的发展规划——《成渝经济区区域规划》促进了大四川地区整体的经济增长,但对于四川、重庆各自的影响仍旧无法判断。为此将重庆和四川分别设置为处理组,其他省份作为对照组,通过合成控制法进行加权平均找到最优拟合结果。从图9、图10分别处理的结果看,无论是重庆还是四川,在规划实施之后都获得了明显的政策效应,与基准估计结论一致。但对比2011年以后实际值与合成值走势不难发现,成渝区域规划对重庆经济表现的促进效果显著大于四川。从具体数值看,重庆2012年人均实际GDP的真实值高出合成值1 225元,此后差距逐渐扩大,2016年高出5 181元;相比之下,四川2012年和2016年的人均实际GDP的真实值分别高出合成值约712元和1 624元。从人均实际GDP的年平均增长率看,重庆的实际年平均增长率高出合成年平均增长率约1个百分点,四川高出为0.44个百分点。由此可以推断,《成渝经济区区域规划》对重庆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明显高于对四川的促进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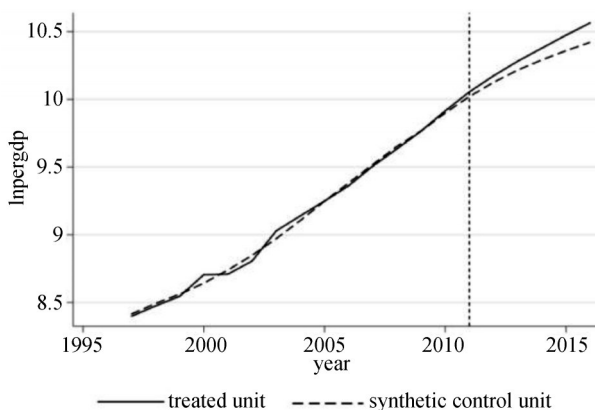


图9 实际重庆和合成重庆增长对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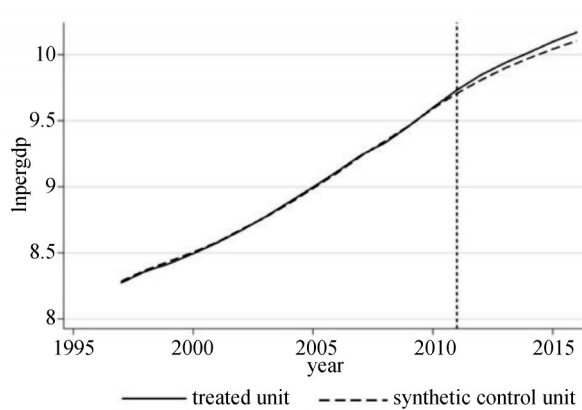


图10 实际四川和合成四川增长对比

(四) 地级市的补充证据

前文从统计上证明了合成控制法所得结论的稳健性,表明2011年构成大四川经济增长的政策冲击,然而上述分析结论是否是《成渝经济区区域规划》产生的结果,还需要做进一步识别。为此,文章按照1995年四川省所辖的23个地级市为样本,将2006—2015年经验数据按原属地级市进行归并,然后根据如下模型进行估计:

$$\text{Pergdp}_{it} = \alpha_0 + \alpha_1 D_{it} + \alpha_2 \text{Dis}_{it} + \alpha_3 D_{it} \times \text{Dis}_{it} + \Gamma X_{it} + \sigma_i + \mu_t + \varepsilon_{it} \quad (1)$$

式中,被解释变量 Pergdp_{it} 是按原属市进行数据归并之后的人均GDP。 D_{it} 为地级市在 t 年是否实施《成渝经济区区域规划》,是取值1,否则取值0。 Dis_{it} 分别表示距离成都或重庆的最短物理距离,用来控制规划实施的扩散 α 效应。 X_{it} 为一系列影响经济增长和人均产出的控制变量,包括年末从业人数、城镇化率、工业产值占比、三产占比、人均固定资产投资、财政自给率、人均实际利用外资,以及反映人力资本积累的生师比等。 σ_i 、 μ_t 分别反映城市固定效应和年份固定效应,用来控制不随时间变化的个体趋势和不随个体变化的时间趋势。 ε_{it} 为随机误差项。 α_0 至 α_3 、 Γ 为估计系数。如果估计结果和合成控制得到的结论能够保持一致,那么 α_1 的符号为正。考虑到空间辐射效应存在的规律, α_2 的系数为负。规划实施效果取决于 $\alpha_1 + \alpha_3 \overline{\text{Dis}_{it}}$ 的符号及其大小。为减少数据的波动性对除虚拟变量之外的其余变量进行对数处理,同时在省份层面进行稳健标准误差聚类。估计结果

见表3。

其中,列(1)是不考虑规划产生的辐射效应及其交互效应的估计结果,列(2)和列(3)依次引入了辐射效应和交互效应。当不考虑规划实施的辐射效应时,实施《成渝经济区区域规划》能够提升人均GDP。考虑辐射效应之后,规划实施能够促进原属地级市人均GDP提升1.35%,增长辐射效应随着样本地级市至成渝双核距离的增加而降低。引入规划实施和辐射效应的交互项之后, α_1 、 α_3 显著为正,因此 $\alpha_1 + \alpha_3 \overline{Dis_i}$ 取正数。说明在控制增长辐射效应之后,《成渝经济区区域规划》仍然能够显著促进地级市经济增长。交互项和 Dis_{it} 之间符号相反,说明《成渝经济区区域规划》的实施能够促进更多外围城市主动融入,从而提高了增长辐射效果。结合合成控制法得到的结论能够推断,2011年《成渝经济区区域规划》的出台,通过直接的增长效应和间接的辐射效应,推动川渝两个省级行政区所辖区域实现快速的经济增长。

表3 线性估计结果

	(1)	(2)	(3)
D_{it}	0.041** (0.019)	0.014*** (0.005)	0.014** (0.006)
Dis_{it}		-0.007* (0.004)	-0.005* (0.003)
$D_{it} \times Dis_{it}$			0.001** (0.000)
控制变量	Y	Y	Y
地级市固定效应	Y	Y	Y
年份固定效应	Y	Y	Y
N	230	230	230
R^2	0.475	0.520	0.639

注:1. 括号内数值为回归系数的标准误;2. *、**、***分别表示10%、5%和1%的显著性水平。

四、机制分析与对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的启示

(一) 跨省规划政策效果的经济学解释

重庆市在1997年升格为直辖市之后,大四川内部重塑的省级行政边界推动四川、重庆两省展开地区竞争。地区竞争的好处在于促使两地提升公共产品与服务的供给水平,以此提高招商引资绩效和经济增长表现,但同时也带来了严重的恶性竞争、地区保护与市场分割问题^[5,8]。两地不仅在交通运输上限制对方,还产生严重的重复建设,直接损害两地经济利益^[5]。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持续推进,以及国务院对成渝地区区域规划试点工作的推动,促使两地政府意识到了过度竞争损失和良性合作的好处,随后开始尝试由竞争转向合作。

《成渝经济区区域规划》的实施,虽然不可能完全消除川渝两地的行政壁垒,但却避免了重蹈过度竞争的覆辙^[8]。同时,跨省合作扩大的市场范围也促使两地遵照各自的比较优势,推动资源、要素流动来提高经济运行效率。两方面的因素共同发力,使得跨省规划能够对川渝地区的经济增长带来积极影响。

关于《成渝经济区区域规划》对重庆的促进作用更加明显,这与重庆升格为直辖市之后的增长趋势有关。1997年升格成直辖市以后,重庆能够获得更多行政、财政权力,从而更有激励经营辖区的资源和要素,以此推动经济增长。除此之外,重庆地方政府官员不仅面临着更大的政治晋升激励,也拥有了辖区内资源调配更大的支配权,这有助于实现他们“一展身手”的可能。同理,相比原来同等条件下四川所辖的市(县)而言,升格之后重庆下辖的多数区(县)行政级别随之提升半级,能够支配和动员的资源得到提高,地方政府与官员更能充分运用调配一揽子资源的权力来经营所辖区域,挖掘自身优势。上述因素促使重庆在与四川协同合作的过程中,更能获得明显的发展。此外,成渝经济区覆盖了重庆全域的31个区(县),对四川只覆盖了15个市(州),这也构成对川、渝增

长驱动存在差异的额外因素。

(二)政策倾斜还是内生动力

不可忽视的是,大四川地区的增长过程与中央给予的重视和支持是分不开的。那么就会有这样的疑问:跨省发展规划产生的增长效应究竟是中央的政策倾斜所致,还是跨省规划在促进资源与市场整合上的内生动力推动了经济增长?

中央政府的政策倾斜体现在中央直接或间接参与地方的投资和给予地方的财政支持上。然而根据两地的统计年鉴能够发现,无论是中央参与的投资,还是给予地方的财政支持,在2011年之后并没有出现大幅度的增长,因此难以从中央的政策倾斜上来解释跨省发展规划对川、渝两地增长的促进作用。具体而言,2000年至2010年中央在四川进行的固定资产投资金额年平均增速28.84%,剔除掉受地震重建影响的2008年至2010年之后,剩余年份平均增速为23.3%,在政策实施之后这一增速下降至7.86%;就比值而言,2000年至2010年四川的中央固定资产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年平均占比为10.77%,剔除地震重建影响年份后年平均占比为11.63%,2011年之后该比值仅为5.36%,远低于政策前的水平。足以说明在《成渝经济区区域规划》出台之后,中央对四川的直接投资增长变缓,投资占比也随着政策实施逐渐缩小。重庆的情况大体相似,2000年至2010年中央在重庆进行的固定资产投资金额的年平均增速为31.38%,2011年之后下降至11.63%,中央投资占重庆社会总投资的比重从2011年之前的9.29%下降至2011年之后的5.09%。中央在川渝地区的投资,无论在增速,还是相对比值都出现了大幅度下降,因此中央参与地方的直接投资并不能完全解释川渝两地在规划实施之后的增长表现。

考虑到中央的政策倾斜还体现在财政支持上,为此利用“中央对地方的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上解中央支出”衡量中央对地方的财政支持。2000年至2010年间,中央对四川的财政支持年增长30.66%,剔除2008年至2010年灾后重建年之后仍保持26.65%的增速,2011年至2016年则下降至7.67%;重庆在政策实施前获得的中央财政支持年均增速为24.94%,而在政策实施之后增速减少一半,下降至12.05%。相比之下,四川本级财政收入年增速从2011年之前的12.6%跃升至之后的21.24%,重庆则从7.78%增加至2011年之后的17.50%。因此从中央给予的财政支持也不能很好地拟合规划实施之后两地的经济增长。当然,在2011年至2016年间,四川的中央财政支持/地方本级财政支持的比值为0.73,重庆则高达1.24,因此重庆相对获得更多的中央财政支持,这在一定程度构成两地增长差异的额外因素。但总体而言,这种支持并不会导致四川和重庆之间产生明显差异,毕竟在《成渝经济区区域规划》出台之后,川渝两地的中央财政支持均在逐步放缓。

当然,不能否认中央的政策倾斜在规划出台之后仍然会影响地方内部的协同合作,完全区分政策倾斜与内生动力两种效应是不可能的。结合前文的分析,中央政府投入的固定资产投资和财政支持促进了川、渝两地的增长表现,但这种政策倾斜并不能完全解释两地在《成渝经济区区域规划》出台之后的增长表现。由此可以推断,《成渝经济区区域规划》为川渝两地的经济增长提供了内生动力。

(三)对新时代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的启示

迄今为止,西部大开发战略已经走过20多年,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4.9%,人均产出与全国平均水平的相对差距不断缩小(2023年西部人均产出为全国平均水平的78.86%)。然而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和全球经济的不确定性,无疑让西部12省(直辖市、自治区)必须充当全国经济持续发展的战略腹地。在工业化与城镇化趋势普遍放缓,基建投资的增长贡献不断递减的现阶段,西部地区如何形成发展合力,降低竞争性内耗,成为探索持续发展的内生动力的关键。从《成渝经济区区域规

划》开始,四川、重庆逐渐形成合力发展格局,除两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的协同经验以外,两地跨省合作还能为新阶段其余西部省份之间协同发展提供如下经验借鉴。

首先,高层推动与地方探索相结合,共建多层次协商机制。《成渝经济区区域规划》从谋划、获批到顺利实施,与中央政府的持续推动、关注分不开。比如最初两地谋划合作是以国务院推动的成渝地区区域规划试点工作为契机,随后实施的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也是党中央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合作成效也离不开地方的积极性和能动性,两地自发探索,建立了党政联席会议、常务副省市长协调会议等一系列多层次的协调工作机制,这种工作模式也可以为其他省份所借鉴。2020年以来,川渝两地围绕跨省合作召开党政联席会议9次,常务副省市长协调会议8次。2024年4月,两地签署《川渝挂驻合作备忘录》,进一步探索互挂工作队、互设办事处的长效合作机制。此外,在重大项目调度、协同立法、联合办公、地级市层面都在不断探索和完善联合决策与工作机制,为跨省合作创造有利的制度条件。

其次,基建互联互通、公共服务跨省通办,保证商品、要素流动畅通。成渝区域规划实施以来,两地“双核”之间已实现1小时通勤,直达动车客运班列日均运行超过200列次;随着成渝、成遂渝、成安渝、成资渝4条双城直连高速通道全部形成,川渝省际高速公路通道达13条。加上在港口、机场建设上的合作,基本保证了两地之间的互联互通。在公共服务上,两地实现政务服务跨省通办,就业社保、医疗卫生、户口管理、住房公积金管理等公共服务实现共建共享。基建网络的完善、公共服务的跨省合作,打破了省份行政边界对商品和要素流动的束缚,为商品流动、劳动力和资本跨省高效配置创造了有利条件。

最后,跨地区合作不是没有竞争,而是适度竞争,以及基于各自比较优势的差异化竞争。《成渝经济区区域规划》实施以来,成都和重庆差异化格局逐渐显现。2023年成都、重庆第二产业区位熵分别为0.75和1.01,第三产业区位熵分别为1.25和0.99,说明成都在第三产业的集聚程度更高,而重庆则在第二产业上更有优势,两地差异化的发展定位逐渐明朗。这种区位熵上体现的差异化战略同样也体现在川渝两省市之间。同年四川全省二产的区位熵低于重庆8.7个百分点,三产区位熵高出重庆3.4个百分点。作为相邻省份,川渝地区在资源禀赋、经济技术水平上都较为接近,完全实现差异化的发展战略并不现实。因此在科技合作、技术研发以及高新技术产业引入和发展上彼此之间仍然存在着一定程度的竞争关系。2023年重庆市研发支出占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2.49%,仅高出四川0.22个百分点。这种适度的竞争关系不仅推动两地之间的人才和技术频繁流动,也在一定程度上带动两地创新能力的同步上升。

结论

地方保护主义是分权治理带来的难题^[28],在一定条件下国家内部的市场分割与地方保护主义造成的福利损失,甚至比跨国贸易壁垒带来的损失还要大^[29]。突破内部的市场分割成为各国中央政府推动区域经济政策的重要内容。中国作为一个典型的行政区经济,地方政府以行政区划为界展开增长竞争来促成快速的经济增长,但同时为增长而竞争也带来了地区间重复建设、市场分割等一系列阻碍增长的因素。研究结果表明,跨省合作能有效将地区竞争产生的溢出效应内部化,通过区域协同、市场整合减轻地区竞争产生的负面效果。

利用《成渝经济区区域规划》作为政策冲击,文章实证分析了跨省经济区对于地区间经济增长的影响,证明了在不进行辖区行政区划调整的前提下,也能实现地区间的资源整合,这一结论对于

边界塑造行政区经济形成一定的冲击^[30]。成渝区域规划显著促进了川、渝整体的经济增长,对重庆经济增长的作用高于对四川的促进作用。这种促进作用具有统计上的显著性和时间上的持续性。文章从地级市经验证据、川渝两地市场整合、官员激励给出了解释。在考虑中央政策倾斜可能带来的影响之后,成渝区域规划对大四川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仍然存在。

除成渝区域规划以外,改革开放以来中央政府在长三角、京津冀地区持续推动的跨省的经济区建设,以此打造区域经济联动的增长极,这些都构成中国能够持续增长背后的特征事实。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快速增长,既是以省为单位内部竞争的结果,同时也是中央利用跨省发展规划来协同区域合作的结果。成渝区域规划对川渝两地产生的积极效果为进一步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提供了政策启示,文章认为成渝区域规划实施过程中积累的中央推动+地方探索、基建+服务共建共享、适度竞争配合差异化竞争的经验,能为西部12省(直辖市、自治区)在新发展阶段如何突破边界利用跨省合作形成发展新格局,持续探索内生增长动力提供借鉴。

参考文献:

- [1] 詹新宇,曾傅雯. 行政区划调整提升经济发展质量了吗:来自“撤县设区”的经验证据[J]. 财贸研究,2021(4):70-82.
- [2] ALESINA A, SPOLAORE E, WACZIARG R. Economic integration and political disintegration[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00, 90(5):1276-1296.
- [3] WANG J J, YEH A G. Administrative restructuring and urban development in China: Effects of urban administrative level upgrading[J]. *Urban Studies*, 2020, 57(6):1201-1223.
- [4] 陈钊. 地级行政区划调整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以四川省为例[J]. *经济地理*, 2006(3):418-421.
- [5] 王贤彬,聂海峰. 行政区划调整与经济增长[J]. *管理世界*, 2010(4):42-53.
- [6] 肖挺. 行政性“做大”城市有利于区域经济增长吗? 吸血、扶贫还是共赢[J]. *中央财经大学学报*, 2020(8):100-115.
- [7] 李邨,徐现祥. 中国撤县(市)设区对城市经济增长的影响分析[J]. *地理学报*, 2015(8):1202-1214.
- [8] 李国平,李宏伟. 经济区规划促进了西部地区经济增长吗:基于合成控制法的研究[J]. *经济地理*, 2019(3):20-28.
- [9] KRUGMAN P. Increasing returns and economic geography[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91, 99(3):483-499.
- [10] HERING L, PONCET S. Market access and individual wages: Evidence from China[J]. *Th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2010(1):145-159.
- [11] BEHRENS K, ROBERT-NICOUD F. Survival of the fittest in cities: Urbanisation and inequality[J]. *The Economic Journal*, 2014, 124(581):1371-1400.
- [12] COMBES P P, GOBILLON L. The empirics of agglomeration economies[J]. *Handbook of Regional and Urban Economics*, 2015, 5:247-348.
- [13] REDDING S J, ROSSI-HANSBERG E. Quantitative spatial economics[J]. *Annual Review of Economics*, 2017, 9:21-58.
- [14] OUESLATI W, SALANIÉ J, WU J J. Urbanization and agricultural productivity: Some lessons from European cities[J]. *Journal of Economic Geography*, 2019, 19(1):225-249.
- [15] O'HARA M, YE M. Is market fragmentation harming market quality?[J].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2011, 100(3):459-474.
- [16] 王贤彬,谢小平. 区域市场的行政整合与经济增长[J]. *南方经济*, 2012(3):23-36.
- [17] MONTINOLA G, QIAN Y Y, WEINGAST B R. Federalism, Chinese style: The political basis for economic success in China[J]. *World politics*, 1995:50-81.
- [18] QIAN Y Y, WEINGAST B R. Federalism as a commitment to reserving market incentives[J].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1997(4):83-92.
- [19] LI H B, ZHOU L. Political turnover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the incentive role of personnel control in China[J].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2005, 89(9/10):1743-1762.
- [20] XU C. The fundamental institutions of China's reforms and development[J].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2011, 49(4):1076-1151.
- [21] 张军,周黎安. 为增长而竞争:中国增长的政治经济学[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8.

- [22] 周黎安. 晋升博弈中政府官员的激励与合作: 兼论我国地方保护主义和重复建设问题长期存在的原因[J]. 经济研究, 2004(6): 33-40.
- [23] 陆铭, 陈钊. 分割市场的经济增长: 为什么经济开放可能加剧地方保护?[J]. 经济研究, 2009(3): 42-52.
- [24] 陈剩勇, 马斌. 区域间政府合作: 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路径选择[J]. 政治学研究, 2004(1): 24-34.
- [25] 孙久文, 原倩. 我国区域政策的“泛化”、困境摆脱及其新方位找寻[J]. 改革, 2014(4): 80-87.
- [26] ABADIE A, DIAMOND A, HAINMUELLER J. Synthetic control methods for comparative case studies: Estimating the effect of California's tobacco control program[J].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Statistical Association, 2010, 105(490): 493-505.
- [27] 刘甲炎, 范子英. 中国房产税试点的效果评估: 基于合成控制法的研究[J]. 世界经济, 2013(11): 117-135.
- [28] SONIN K. Provincial protectionism[J].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2010, 38(2): 111-122.
- [29] COUGHLIN C C, NOVY D. Is the international border effect larger than the domestic border effect? Evidence from US trade [J]. CESifo Economic Studies, 2013, 59(2): 249-276.
- [30] YANG B J, PARTRIDGE M D, CHEN A P. Do border effects alter regional development: Evidence from a quasi-natural experiment in China[J]. Journal of Economic Geography, 2022, 22(1): 103-127.

The economic impact of Chengdu-Chongqing economic zone on Sichuan and Chongqing: Also on the implications for forming a new pattern of western development in the new era

FENG Guoqiang, YAN Zhiyi, MA Tong

(School of Economics, Lanzhou University, Lanzhou 730000, P. R. China)

Abstract: While adjusting administrative divisions, local governments also achieve the goal of integrating resources among regions through cross-regional development planning. The question this article seeks to answer is whether this kind of regional development planning that breaks through administrative boundaries can drive cross-regional market integration, and thus affect the overall resource allocation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of the region. Taking the Regional Planning of Chengdu-Chongqing Economic Zone officially issued by the State Council in 2011 as a quasi-natural experiment, this paper uses the synthetic control methods to estimate the impact of this cross-regional development plan on the economic growth of Sichuan and Chongqing province. Combined with panel data from prefecture-level cities, as well as empirical data on fixed assets investment and fiscal revenue in Sichuan and Chongqing, and changes in the allocation of economic affairs authority between the two regions, the mechanism of action is examined to provide insights for further promoting western development and forming a new pattern. It is found that Regional Planning of Chengdu-Chongqing Economic Zone has promoted the overall economic growth of both Sichuan and Chongqing, and has a higher role in promoting Chongqing's economic growth than Sichuan. The mechanism test shows that cross-provincial cooperation can effectively internalize the spillover effects generated by regional competition, and alleviate the negative effects of regional competition through regional collaboration and market integration. The empirical conclusions of the article can be applied to the analysis of the cross-provincial economic zone construction that the central government has been continuously promoting 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Beijing-Tianjin-Hebei region and other regions. To some extent, it can be inferred that China's economic growth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is both the result of internal competition among provinces and the result of the central government's use of cross-provincial development planning to promote regional cooperation. The conclusion of the article is that the key to shaping a new development pattern in the western region is to effectively promote cooperation among provinces in the western region, form a joint force for development, and reduce competitive internal friction.

Key words: administrative economy; economic growth; cross-provincial cooperation; Chengdu-Chongqing economic zone; new pattern for the western development strategy

(责任编辑 傅旭东)